

湘版好书

一部解读百年大党青春密码的厚重之作

——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

张勤繁



初心如磐风雨兼程，铁骨铮铮淬火成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系统总结这种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是党史党建研究必须回答好的重大课题。由欧阳淞主编、老中青三代专家历时4年共同编纂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以恢宏的视野、严谨的史观、系统的梳理，深入而生动地回答了这一课题。这部著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史”的结项成果，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日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与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

对党的建设发展脉络的科学构建

任何历史研究，都需根据事物发展的不同

党的建设研究方法的深化与突破

学术研究方法如同“脚手架”“导航仪”，是

阶段特征，科学标定观察的时间维度。《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分期严谨、主线鲜明的宏大历史叙事框架。

此前，关于党的建设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特定时期、特定领域或专题论述，而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体系最为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通史著作，填补了该领域系统性通史研究的空白。

一方面，该书将观察的时间回溯到1840年后的中国，把“近代中国与共产党的诞生”作为第一卷，深刻论述了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后四卷则分别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展开，深入研究不同历史方位下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做法成效、经验教训，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壮阔征程，勾勒了一条环环相扣、内在贯通的历史发展主线。另一方面，聚焦我们党“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的这一创举，以“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三大历史性工程为内容主轴，将看似分散的历史事件与实践整合成一个目标递进、逻辑自洽的整体叙事，超越了简单的编年史记录，使读者能够清晰把握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辩证统一的发展轨迹。

开展学术研究的核心支柱。剖析《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编纂肌理可以发现，这部著作突破了传统党史叙事的单一政治史框架，创造性地融汇了社会史、思想史与制度史的多维视角，科学借鉴政治学关于政党适应性、组织学关于制度效能、社会学关于社会动员等理论工具和分析概念，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与深度创新。

编纂者不仅关注党的纲领、路线和重大事件，更将党的建设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思想文化激荡和国家治理形态转型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这种紧扣主线、跨学科对话的立体化视角，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深邃道理。

同时，该著作坚持把全局观照与细节深描有机统一起来，既从完成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的宏观高度把握每个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调整，又善于选取“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运作、开展“双学”活动的具体部署等微观个案进行深入刻画，从一个个案中自然提炼出关于“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等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深层规律，体现出鲜明的实证精神，使得过程还原更加细致、历史叙事更加丰满。

历史经验与当下及未来的对话

历史研究是“通古今之变”的学问，既要求真，也要致用。当前，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如何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如何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核心课题。《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编纂与出版，正是回应这一时代之问的“历史工具箱”。

这部著作从第一卷对建党“历史必然”与“主体自觉”的哲学追问，到后续各卷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主题的精准提炼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共同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动态演进轨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特别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的翔实记录与深入分析，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了直接的镜鉴和启示。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这部著作是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生动教材；对于各级党组织而言，它是探索党建工作规律、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党建质量的重要参考；对于学术界和理论界而言，它为深入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构建中国自主的党建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权威的文本基础和系统的学理框架。

总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是对百年历程的庄重记录，更是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航。在这部著作中，历史不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奔涌的源头活水，滋养着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生动实践的磅礴力量，浇灌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编者说

由北京服装学院陈芳教授领衔著的《衣冠含章：中国古代服饰探微》即将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与读者见面。它既是一部将物质文化的视野引入服饰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代表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新取向，为服饰研究者、设计师、学生以及艺术史、考古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服饰材料和研究进展；又是一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读物——通过普及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视野，让普通读者对中国古代服饰的认知不再停留于审美以及影视剧里“服化道”的层面。

这部新书由17个个案构成，涉及从名物考据、复原到塑造“华夏衣冠”的独特观念的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在书中我们不难看到，对古人而言，衣冠服饰从来就不简单的事，而是一套加诸身体皮肤之上、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象征系统”。对士夫君子而言，最直接的体现其言行合于礼法又能体现其身份与社会责任的方式，便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而中国所推崇的圣人以礼教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政治，则叫“垂衣裳而天下治”；至于所谓的“衣冠含章”，更是成为我华夏为礼仪之邦的文明象征。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部作品其实提供了17个从服饰史来管窥中国诸多重要历史节点的视角，让我们透过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新进展与跨学科研究的新视野，在看似小众的服饰史领域中看到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地缘与身份认同乃至晚明世风和民国时尚之变等诸多别开生面的历史面向。

《衣冠含章》所采用的是一种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人文学术在经历了所谓的“语言转向”与“视觉转向”之后，迎来了“物质转向”，即物质文化的视角。《衣冠含章》以这种视角将中国传统服饰理解为一种艺术生产，这种生产实践的繁荣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这是理解物质文化的方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度。相对独立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而言，不管朝代如何变革，我们日常生活的艺术(服饰)呈现出的是一种更为缓慢的变迁，艺术(服饰)生产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且在其内部会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技术系统与相对稳定的实践传统。而当服饰发生重大的变迁时，又是王朝兴替重要的视觉指征。因而将服饰视作一种物质文化来考察其(艺术)生产的变迁，对历史研究、艺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性意义。

而《衣冠含章》对中华服饰文化核心的深刻总结，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学术视野，它用“探微”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古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生活，看到社会生活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引发我们重新审视衣冠之于华夏、之于历史、之于我们当下的意义。在文博热与国服热的今天，也许这样一种思考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衣冠含章：中国古代服饰探微》特约编辑)

对古人而言，衣冠意味着什么

李震

走马观书

寻找失落之城楼兰



的军事交锋，“楼兰”这个名字首次震动中原，成为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起点。唐代诗人屡屡吟咏汉将在楼兰的功绩，却不知那座传奇之城，早已湮没于罗布泊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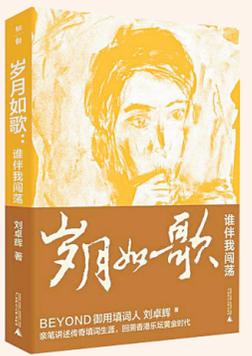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内楼兰研究第一人陈晓露教授新作《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推出。在书中，作者以大量科学、准确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为依据，带领读者看见最真实的楼兰。

从史前混血族群的悄然扎根，到汉匈铁骑下的战略要冲；从唐诗中的功业符号，到黄沙下重见天日的文书壁画……楼兰的四千年，恰是人类与极端环境共生、文明在夹缝中绽放又凋零的缩影。书中那些关于适应、交流、坚守与消亡的故事，不仅属于过去，也映照着我们自身文明命运的思考。

再现华语流行音乐“黄金时代”

“流行音乐没有辜负80后”。随着从卡带到MP3，从露天喇叭到KTV包厢的变迁，80后成长的时期正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香港著名填词人刘卓辉音乐随笔集《岁月如歌：谁伴我闯荡》。本书作者以亲历者视角，系统梳理其三十余年填词生涯，收录多篇与Beyond、张学友、陈奕迅等音乐人的深度对话与合作实录，并通过对罗大佑、苏芮、齐豫等音乐人的观察，再现香港与内地乐坛互动历程，为读者呈现一幅生动而深刻的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图景。

刘卓辉作为香港乐坛代表性填词人，曾创作《大地》《情人》《谁伴我闯荡》《岁月如歌》等经典作品的歌词，并创立大地唱片、字母唱片，推动了内地原创音乐发展。本书不仅是他个人音乐生涯的回顾，更是一部以词人之眼观察时代变迁的文化札记。



书香闲情

诗词里的《太平年》

书澜居士

正在热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将镜头瞄准五代十国的烽烟与离乱，那些与这个时代相关的诗词，也如时间的渡口，连接着当时人的呼吸与后世人的目光。它们有的诞生于乱世之时，是现实的脉动；有的则书写于百年之后，是历史投下的绵长回响。当剧中人物在权力的棋局与民生的天平间挣扎抉择时，这些诗词也成了他们未曾言说的旁白和注解。屏幕上的刀光剑影终会暗淡，但这些文字承载的对“太平”的执念，穿透千年，成为我们与历史对话时，最温柔也最有力的情思。

1. 秦妇吟(节选)

韦庄

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寨)营中填饿殍。长安寂寂何所有？费市荒街麦苗秀……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生在晚唐五代之际的文人往往是脆弱的。他们在山河破碎中不得不随波逐流，依附于割据的武将，以保全性命于乱世。但他们并非完全无力，他们用手中的笔记录了世间百态。这首长诗是剧中乱世背景的核心注脚。它通过一位妇人的血泪控诉，生动描绘了黄巢起义后长安“血流成河、公卿骸骨暴露于街”的惨象。剧中以此诗开篇，瞬间将观众带入那个秩序崩塌、人命如草芥的特定历史时期，为后续所有关于战争、流离与重建“太平”的故事奠定了沉重且真实的基调。

2. 天道

冯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作者冯道，他可能不是十分出名，但大家一定听过“但知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格言，这句话正出自上面这首诗。冯道出生于一个普通耕读家庭，他凭借先天的智慧聪颖和后来的勤奋好学进入仕途。他的仕途生涯跨越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契丹(辽)五个朝代，历经了十余位君主，长期担任要职，被誉为“官场不倒翁”和“十朝元老”。

“穷达皆由命”反映了在五代乱世中生命是渺小的，命运也是不可控的，所以悲欢生死都是不值得哀叹的。“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可理解为乱世中自我内心的坚守——就如冯道专注具体善行，救济百姓、发展文教，却不问政治归属。“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则以自然循环隐喻政权更迭的必然性，表达对“乱极必治”的期待，暗合道家“天道循环”思想。冯道的《天道》启示着人们，当你无力改变周围环境时，避开世界的纷扰，顺应规律，然后坚守内心，才是最大的智慧。但知行好事，莫问前程，冬去春来，这是天道。

3. 普满题涪州佛舍

佚名

此水连涪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

“此水连涪水”：这句诗中“此水”合为“泚”字，指唐朝中期发动叛乱的藩镇节度使朱泚。“涪水”则指涪州兵乱，是叛乱的起始。诗中“血满川”的残酷现实与“太平年”的美好愿景形成强烈对比。人们总是在叛乱爆发之后才对

“太平”恍然大悟。尽管全诗充满隐喻，但其最终指向是对战乱的深切忧惧和对和平的强烈渴望，反映了动乱时代人民的普遍心声。

4. 述国亡诗

花蕊夫人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是后蜀亡国后，后蜀后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面对宋太祖所写的激愤之作。它从一个后宫女性的视角，犀利地批判了军队毫无气节、望风而降的亡国景象。这首诗表达了后蜀灭亡之时的屈辱、愤懑又不甘的复杂情绪，是五代十国时期从女性视角发出的声音，尤为珍贵。

5. 陌上花三首(其一)

苏轼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这是北宋诗人苏轼的一首绝句。苏轼在游历杭州九仙山时，听到当地流传的民歌《陌上花》，深为触动，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的灵感，源自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鏐(ì)写给王妃戴氏的一封信。相传，戴妃每年春天都要回临安娘家省亲。有一年，春色已深，陌上花开，王妃仍未归。钱鏐思念妻子，便提笔写信，其中写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短短九个字，没有急迫的催促，而是通过描绘眼前春景，委婉表达思念。钱鏐作为乱世中保境安民的君主，对妻子的深情使其形象更为丰满。

6. 清平乐

李煜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公元971年秋，南唐后主李煜派弟弟李从善去宋进贡，被扣留在汴京。974年，李煜请求宋太祖从善回国，未获允许。李煜思念之深，常常痛哭。陆永品认为这首词有可能是从善入宋的第二年春天，李煜为思念他而作的。

春天过了一半，北去的从善迟迟未归，目之所及竟让人断肠！然而，愁绪如落花，刚被拂去，又立刻落满一身。这种挥之不去的愁思，精准地表达出李后主那种无法排遣、纠缠不休的深切痛苦。离恨不是静止的，而是如此主动、固执地包围着他。大雁回来，没有音信。在李煜之前，春草是柔软的，有生命力的。而李煜的春草带有侵略性，不断扩散、弥漫，随着他的国家破灭，一点一点地爬上了他的城墙。

